

王蒙文存

第十卷



# 王蒙文存

第十卷  
中篇小说（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文存 .10, 中篇小说 .2 / 王蒙著 . - 北京 : 人民  
文学出版社 , 2003.9

ISBN 7-02-004293-7

I . 王 … II . 王 … III . ①王蒙 – 文集 ②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3026 号

# 目 录

## 中 篇 小 说(1984—2000)

鹰谷	( 3 )
名医梁有志传奇	(50)
一蹙千娇	(85)
球星奇遇记	(126)
蜘蛛	(188)
九星灿烂闹桃花	(259)
郑重的故事	
——又名 107 事件档案或 250 万美元与诗	(317)
春堤六桥	(387)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415)

# 中 篇 小 说

(1984—2000)

# 中 藏 小 簿

(1884—2000)

## 鹰 谷

你可还记得那初雪后的深山，山路蜿蜒如随手一抛的丝绸飘带，敞篷大卡车载着你和你的伙伴向林区腹地急驰，风几乎把你头上的帽子吹落，雄鹰仄歪着，展翅在你的车前，你好像看到了鹰的忧郁的眼？

你可还记得那深山里的峡谷，众石如来自昨天群星的大陨雨，润水涛涛陶陶，活泼如歌如嬉，水花四溅如珠如雪，水纹如旋如卷如织，而罩在水上是永远散不开的迷雾、山路和倏而一现的丽日金光？

你可还记得那云杉林里的芳香，欲融还留的薄雪上的兽蹄足迹，伐木工的悠扬、深重而又威严的号子，这些膂力过人的壮汉的执拗、快活与得意洋洋以及等待装车的汽车司机的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却还要讨好赔笑的脸？

还有林间的小木屋，夜半的篝火，哈萨克牧人的皮衣皮帽，伐木的电锯的嗡嗡沙沙和大树折断的断裂巨响……

还有一望无际的荒漠的戈壁，夜半的警告，突然的险情，一碗撒着姜丝和葱丝的热汤面，寂寞中的哄堂大笑……

还有烧得半生不熟的狍子肉，行军壶装着的劣质白酒，牧人帐篷里半导体收音机发出的最新指示；还有人们的相望于白眼？相濡以沫？相亲相助于危难？

有些事我们不愿忘记。

时过境迁，有些事我们或以为已经忘记。在临窗的树叶、吊兰花

盆、石雕与窗外巨大的烟囱、起重机、脚手架与突然升起的一座座新楼之中，我们已不再能看到那爬到高高的雪松上攀折枯枝当柴烧的哈萨克儿童的笑脸。在电话铃、汽车轮、鼓风机与种种现代音乐的嘈杂的交响之中，我们已经许久忘记了那甘甜的林中号子。

哦，那么快就落满了浮尘的记忆！

如今，我又想起了你，我又重新与你聚首，我并没有把你忘记。这是多么快乐呀，当我重新闻到了你林中的芬芳，重新听到了那祖祖辈辈唱下来的古老的迷人的号子，重新看到了那相隔相遮的遥远的峰峦叠嶂之中落下的那一年的第一次肃穆温柔的白雪。

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大卡车在公路上飞驰。我们四个人扶着司机楼顶和前槽子板，迎风一排站在车槽前面。这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其时我们正在乌鲁木齐南郊的文教“五七干校”就读深造。九月底，在新疆已经是很冷了，冷风吹透了我们的并不单薄的衣裳。我下身穿上了薄棉裤，上身是一件绒衣、一件毛线衣、一件破褂子，外加一件长毛绒领子裁绒短大衣。艾利和图尔迪是原自治区卫生厅的干部，现在干校七连，他们连队显然有较厚的家庭，给这两位维吾尔族同志各借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公家的大衣，落光了扣子，但每人腰间扎着一道绳子。艾利友好地给了我一根绳子，这根绳子确实帮助我少受了许多寒气。第四个人叫朱振田，他只穿了一件对襟小棉袄，只戴了一顶单制帽。上车前我一再友好地提醒他多拿衣服，被他哼了一声拒绝了。艾利本来也想给他一根绳子以便把衣服扎紧，他哼也不哼就拒绝了。在车上，我与艾利、图尔迪三个人紧挨着站，他自己一人在一边独行特立。

有什么了不起！我想起他的事便觉得可叹可气又复可笑。但我顾不上笑，因为我的感冒还没有好，我已经感冒一星期了。冷风吹得我忍不住地流鼻涕，我只顾得上一会儿一揩鼻子。我的这种不雅的动作逗得艾利笑起来，他悄悄对图尔迪说：“这位老兄真熊！”

我听到了他的议论，立刻接了过去：“熊归熊，力气还是大大的有，不信吗？哥儿们！”

我的辞锋为我捞回了一点面子，艾利向我挑了挑大拇指。但很快空气又变得凝重了。颠簸，沙沙的车轮，突突的马达，没完没了的道路，从路旁一闪而过的房屋和树木，令人晕眩，令人发困，冷风与困意在我们身上角逐，我们被夹在寒意与睡意之间。

而且，我们的情绪都不太好。九月二十九日，本来是我们这几个连队休假的日子，大部分同志二十八日晚上便坐市郊火车回乌鲁木齐度假去了，他们将和家人团聚，过一个快乐的国庆节。但二十七日晚上，我们四个人接到通知，要到数百公里以外的鹰谷林场去拉运木材，预计五六天才能回来。山里很冷，领导上告诉我们要多带行李和衣服。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伙食，一气要带够六天的干粮和副食品。从哪一方面看这都是一次苦差事。接受任务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互相一看，一看便知我们四个人去合适。

朱振田在我们四个人当中最年长，已近四十五岁，中等身材，黄皮蜡瘦，留着一个刚刚开始歇顶的小平头。其实，他是我们当中的大力士，身体如铜铸铁打，各种农活、建筑泥水活全套把式都在行，而且能吃苦，能耐劳，有韧性，有长力。多少块头比他大、样子比他威风的人干起活来对他都甘拜下风。

打起架来他大概也很英雄，虽然在干校期间他没有多少机会施展他这方面的才能。据说他也曾一度参加过某派群众组织，有一次需要冲击另一派的会场，但大门被另一派关了。朱振田露了一手，平地翻高墙，跃墙而入，然后打开了大门，把自己的派友放了进去。平日闲谈之中，他曾对我们几个“眼镜”夸口，说他可以用他的两个手指折断我们的肋骨。“你敢！”“眼镜”们予以痛斥，有的还进一步斥之为“匪性未改”或“什么东西”，但这些有力的驳斥中并不包含对他的手指威力的疑义。

我在一九七一年是三十七岁。比我只大一岁而显得比我老得多

(我自以为,可能事实并非如此)的是艾利。艾利矮胖,腆着开始圆起来的肚子,黄头发黄胡子,满脸毛绒绒的,两粒眼睛小、圆、刁、有神。卫生厅的少数民族同志都称他为“艾利科长”,但他从来没有当过科长。科长、处长,宁有种乎?按他的资历和才能,也许他早该提副厅长了,但是……

最漂亮、最谦逊、随和之中似乎蕴含着苦味的是图尔迪,他三十三岁,高个儿宽肩,两只大眼睛英俊而又秀气,除了肤色嫌黑了一点以外,他的外表是第一流的。但他的举止稍嫌忸怩,以致使人觉得他缺少一点男性的雄健粗犷。艾利对他,亲热之中包含着一种优越感,一种颐指气使的放肆。图尔迪呢,柔中隐约含刚,对艾利,也许不仅是对艾利,他亲之敬之如待兄长,却也不失其警惕。

用人之道,精矣!把我们四个人派在一起出差干活,乍一听似乎晦气,继则令人愉快了。我大概是这四个人中最愉快的一个了。我在乌鲁木齐没有家,我压根儿就没想回城休假,本来就想主动申请值班的。过去,我就多次单人留在连队值班,值班期间给自己烙葱油饼,熬放葡萄干的甜稀饭,值班期间我学会了江水英、郭建光、马小强的许多唱段,倒也悠然。而且,我非常乐于在早来的边疆的初冬进山。我向往山林也许不下于向往大海。

四个人的相聚初则使人沮丧当然是有原由的。首先,四个人当中就有两个人不是“五七战士”,就是说,有一半人还算不上“人民”。在“五七干校”上学的人有一个光荣的称号:“五七战士”,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这样的称号。

例如朱振田,原来是国民党新疆驻军中的小军官,随着一九四九年新疆的和平解放而被收编。据他自己说他只代理过两个月的副排长,但收编后填表,他为了骗取一个更高的待遇而虚报自己是连长。这样一来,“匪连长”的身份一直伴随着他。“真他妈的匪连长!”他的同事们常常这样嘲笑他,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无太多恶意,他也并

不计较，最多反唇相讥别人的短处。如遇到地主出身的，那么“匪连长”的称呼会引出“地主崽子”的回应，从两人相唱和的表情上很难看出那是爱称、戏称还是蔑称。

但清理阶级队伍中宣传队的同志坚持认为既是“匪连长”，便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反革命。既是历史反革命，又不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便是翻案，理应抗拒从严。其实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就已经搞清楚了：他确实只不过是代理“排副”。

朱振田之可爱与可恶就在于他始终又臭又浑又硬，还挺“个人英雄主义”。在一个文艺单位做行政管理员，他本来常常得罪人。对本单位的众多的“眼镜”、秀才、笔杆子们，他又一百个瞧不起。“狗掀帘子，全仗着嘴！”这就是他对于众知识分子的衷心的批判总结。他真心认为那些年头贬低知识分子的论调是正确的，“不会做工，也不会种田，也不会打架”的话，他常常挂在嘴边。原话本来是说“不会打仗”，他篡改成“打架”了。“清队”中由几个秀才组成了专案组来审查他的历史，为首的那位秀才恰恰是一位最能说而最不能做的，他认为。他态度倨傲，蛮不买账，经常还用一些“左”的词句来表达自己“怀忠不遇”，似乎他比专案组的人更革命。

“老九”再晦气，反革命却是“老三”！“老九”们再低头，也不必在“匪连长”面前谦虚……于是，朱振田在清队之后，便被“挂”了起来。

“挂”也还是这样，我行我素。你愈瞧不起他，他便愈瞧不起你。这便是朱振田。

再一个非战士便是图尔迪，他之所以当不成“五七战士”，据说是由于被揭发了一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艾利和我好赖还是“战士”，维族话叫做“江契”，发音有力，而且和汉话挺接近，读起来挺有味道。

“您是‘江契’吗？”艾利一上车就问我。他大概也听说过我的事情。

我点点头。艾利脸上显出喜悦、失敬的歉意、引为同道的亲近与

高那二人一等的得意表情。他用嘴一努，向我耳语：“图尔迪不是‘江契’。”

“朱振田也不是‘江契’。”我说。艾利的反应是惊喜，我说完自己却觉得有点没意思。

“我的妹妹是迪里拜尔。”他向我眨一眨眼。

“哪一个迪里拜尔？”我问。

“您到北京不知道迪里拜尔？”他摆出一副绝不可以原谅的不满表情。

“是中央歌舞团的迪里拜尔吗？”

“对，就是她！”

我当然知道著名的维吾尔族歌唱家迪里拜尔。她唱的《当葡萄熟了的时候》《我心爱的牧羊姑娘》不但风靡全国，而且流传亚、非、拉。她唱歌的时候会做出一种很自然得体的类似维吾尔民间舞蹈的动作，她的两只戴着手镯的白玉般的手臂，在肩上轻轻摆动，迷人极了。

迪里拜尔使我想起了一些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往事，但我身边只有她的哥哥艾利。

他是她的哥哥吗？短粗茁壮。而且，他的“生活作风”的名声极不好。在干校，他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搞名堂。这就是他这个“江契”此次国庆节不得休假而要与两个非“江契”和一个他认为“江契”身份也不无可疑的人一同进山的原因。他的形象和他的风度无论如何无法使我把他与迪里拜尔联系起来。

“您是……迪里拜尔的亲哥哥？”我提出了这个不礼貌的问题。

“当然。一个大当子（爹），一个阿囊子（娘）。”

无可置疑。

汽车离开了公路，岔入了伸展在荒凉戈壁中的便道。突然间加剧了颠簸筛摇，我想起手工摇动着的搁在瓦盆上的柳条筛，筛子上跳

动摇滚的黑煤球，那是童年时期在旧北平常常看到的。便道两旁一片灰黄，碎石粗沙，芨芨草骆驼刺，连天色似乎也变得灰黄了。荒凉瀚海，沉睡了亿万斯年的大地，当你得不到人类的心血的灌溉的时候，你似乎丑陋、烦闷，细想起来还多少有一点恐怖。如果一个人整日在灰沙与褐草里行走，他能够不愤怒吗？他能够不害怕自己早晚也要变成一块永远沉默的石头，消失在无边戈壁之中，自身也变成戈壁无涯的一部分吗？

这种低沉的情绪很快就被打破了。迎面驶来一串七辆解放牌大卡车，非常威武壮观。车上装满了圆咕隆咚的原木。原木大都有三人合抱那么粗，长长的，上端像管炮筒一样伸展到汽车驾驶室上面，瞄向天空，下端伸出车身老大一截。每车原木都装得非常之满，有两排木头已经溢出了车槽，是靠粗大的缆绳捆绑固定住的。汽车沉重地嗡嗡怒吼，每个汽车司机都态度严肃，全神贯注，他们的表情使我体会到了这超载的每车的木头的分量。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从鹰谷林场拉出来的！”艾利指着这一串汽车，有些兴奋地说。

“鹰谷！”我叫了一声。

“就在前面，快到了！”艾利指一指前方，说。

前面什么地方？我看不见的仍然只有灰的石，灰的沙，褐的野生植物。与方才不同的是，褐色的枯干的芨芨草、梭梭柴与骆驼刺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些斑斑点点的绿，显示着未凋的活的生命。还有斑斑污秽的白色，看来是没有被风吹尽的残雪。这边已经下过雪了，但戈壁滩上的雪是存不住的，大风吹过，雪就无影无踪，剩下的仍然是裸露的沙石灰土。看来，汽车开始向风小的地方开行了，不然，怎么渐渐看到了一点绿草白雪了呢？也许，这就是快要到鹰谷的征兆吧？

我抬着头，凝视着前方，终于，看到了远方灰蒙蒙的山路。

维吾尔人大概是我们知道的最富有耐性的人。一九六五年我在

南疆叶尔羌河畔，曾经目睹一个农民一大早到公社找一个干部。那个干部不在，这个农民便靠墙坐到一株核桃树下，整整等了十二个小时，中间连饭都不吃。虽然一直有人招呼他吃饭，都被他礼貌地却是执拗地谢绝，直到晚上九点已过，他要找的同志才姗姗归来，他终于办成了自己要办的事，不慌不忙地离去。

艾利所说的“快到(鹰谷)了”的“快”字，大概也是出自他们的传统的耐心美德。因为，就在他给我以“快到了”的安抚以后，我又整整在卡车上摇了两个小时，摇得我肚子肠子微微作痛。风吹得我的脸又冷又烫，又像冰镇又像火烧，甚至连两只眼珠子，也觉得被风吹得酸疼。老站着摇太累，我便坐下。一坐便跳了起来，整个屁股与车板不断撞击，颠簸得更加剧烈和生硬了，于是便又站起。

“空车，颠得厉害，等装上木材就好了。”艾利安慰我。

我笑了。是的，什么都会好的，什么什么。

汽车进山，道路开始好了一点。路标不再是交通厅埋栽的标准石质里程碑，而是写着“林”字标记的木牌。这就是说，以下的山路，不再是交通厅修筑和管理，而是由林业厅专为采伐管护森林资源而修的了。

“林”字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眼底，但暂时还没有任何“林”的影踪，除去在山口有一株孤独地伫立着的胡杨树。胡杨的叶子小、残缺不圆、抽抽巴巴，好像洗皱后忘记了展开。连同它的发育不良的躯干，都诉说着生命的艰辛。

初时，上坡还是缓缓的，渐渐愈走愈陡起来。太阳常常被山遮住，投下巨大的阴影。而当汽车开向了对面两峰之间的山谷地区，却又见到了灿烂的太阳。有好多只鹰，在山谷的上空盘旋飞翔。

路面颜色逐渐深起来，变成了黑色。“前面有煤窑。”艾利告诉我说。果然，再拐了两个弯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黑黝黝的山洞，便是土法开采的小小煤窑。我看到了一个身穿发污的白小褂的“矿工”推

着小煤车往煤堆上倾倒的情景。

过了煤窑以后，是山间的一块不小的“平原”，四周都是山，汽车在中间起起伏伏，大致行驶在一个小平面上。开始出现了不知名的野果树、阔叶树和少量的针叶树。出现了一片一片的草地，枯黄中有绿点，有白雪，有马、牛、羊蹄的痕迹。我还看到了一个高高地骑在骆驼背上抱着孩子喂奶的哈萨克的妇女。哈萨克妇女的脸红扑扑的，简直像是被夏天的阳光晒透了的石榴。

“哈萨克！”艾利欢呼，“我们到草场来了！”

图尔迪不做一声，他含着笑，忧郁而亲切地望着四周。

“山上有哈萨克！我带你到哈萨克的帐篷里去吃手抓羊肉！”艾利转而对我说。

我翻翻眼，对于吃手抓羊肉的前景且信且疑。

显然，随着汽车轮子坚持不懈地向前转动，艾利的情绪愈来愈高。

“可惜是冬天，没有酸马奶。”我回答，并借此表示，对这一切，我也并不陌生。

汽车戛然而止。前面是用几根砍伐了但没有削去枝叶的云杉树搭成木门，就像学生们的夏季露营搭成的营门，或是一个带有山野风味的凯旋门似的。“凯旋门”右面挂着木牌，上面写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鹰谷林场检查站”。左面门柱上贴着大字标语：“山路危险，注意安全”。不知道是林场的哪位画家，还在标语下面画了一个骷髅。

司机跳下驾驶室，向林场工作人员交验了介绍信，回头告诉我们说：“再跑两个钟头。”

进了林场的门以后不久，便是一座架设在山涧上的大木桥。桥的上方是编起的弧形钢筋。车过桥上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几乎同时喊起来：“水！”

我们终于看到了水，这新疆的“五行”中最缺少的一行。

从此，汽车虽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太阳虽然如同与我们捉迷藏，忽隐忽现，忽然照到你的前头，忽然绕到你的身后；林区公路虽然忽然靠着山头的一侧，忽然越过一个小桥以后又傍着山头的另一侧；但大致上，公路是依傍着山涧修的，我们总是能够看到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或明或暗的涧水，看到活泼流动的涧水的跳跃、飞溅、旋转、下泻、停滞与畅流。我们还听到了比已经使我们的耳朵和神经麻木的汽车马达声与车轮碾轧声顺溜万倍的水流声。

随着这令人心醉、令人从粗暴变得从容、变得温柔的流水声，我们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山坡上是一丛又一丛的暗绿色的云杉树，路边白雪里伸出了参差不齐的草茎。到处都是车辆的辙痕和人畜的足迹。可以看到稀落的简易却也是坚固的瓦顶泥房子。汽车走到一家门口，便停下来。素日对我们吆三喝四神气十足的司机给这一家带来了洋葱，又给另一家带来了青辣椒，我们在车上可以听见森林工人的家属与汽车司机的说笑声。原来这些深山老林里的人家，就是靠来往的车辆给他们带日用生活物品来过活的。

“汽车司机对林业工人是有求必应。要不然，你一个车开上来，他给你撂一个星期不理，硬是让你装不上木头，回不去。别看新疆的司机厉害，到那时候，真有急得哭鼻子的。”艾利向我解释说。

即使是在目力看不清的地方，即使是在暮霭里，长着树的山与秃山看起来也完全不同。长着树的山看起来是蓝紫色的，边缘的线条与色彩也特别柔和，你一看便不由得相信，那边山上深含着许多幽雅和美丽。而在更高处，是皑皑的庄严冷傲的白雪。这白雪与路边的初冬才下的头一两场雪不同，这是积年不化的雪，谁知道这清冷砭骨的银冠是地球的那个年代的古董？而这美丽的银冠下的远山，看来却虚无缥缈，像山，却又像一片紫灰色的云。

到深山去！到深山去！到深山去啊！一个看不见的精灵似乎在我的耳边低语，在我的耳边低唱。

你好，鹰谷。你好，雪，树，山，云，涧，石头，还有正在落山却变得

更加金碧辉煌的太阳。

半明半暗之中到达了目的地——林场第二采伐区第四队。汽车把我们撂下就连夜开走了，这次，司机用不着为装车而操心。我们四个人的任务，是在林场指定的这个区域，寻找和集中分散在各处的合格原木。这些原木，据说是过去购买木材的大户前来拉运的时候，东一根西一根漏掉的，或者是因为规格上稍差一点，被购木一方故意丢掉的。我们“五七干校”要盖房，木料不够，与林场几经交涉，才被允许在已经拉了五车木头以后外加我们这一车，条件是我们出人，自己找，自己运，自己装。

半明半暗的天空上，只有一颗橙色的星。经过长途跋涉，下得车来，我们觉得有点晕眩，觉得突然安静下来，因此山谷里流水的声音更加清晰响亮，觉得周围的大小山头黑黢黢像蹲伏着的巨兽，觉得快乐而且有一点饿了。

我们的身旁便是我们的宿营地，那是一间木房子。不是那种像积木搭成的似的油漆得漂漂亮亮、组装得整整齐齐的木板房子。而是原始的野人的木房子。前、后、左、右、上，五面全部是由只砍去了枝叶、却没有剥下树皮的圆木头排列组成，木头之间用一种“门”形的大铁钉——有人称作“蜈蚣钉”，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相联结、固定起来。

我们还顾不上进房子。第一步是烧水吃饭。木房旁有一架装着用废油桶改装成水桶的手推车，显然是二区四队的工人专为我们留下的。谢谢他们，我们立刻分了一下工，我和朱振田去推水，艾利和图尔迪去拾柴。

“这儿顺手一捡就是一堆柴，你们捡完了就休息。”朱振田神气活现地说。他主动抢重活干，但又必须把这一点指出来，不想得便宜，但是一定要卖乖，这就是“匪连长”的性格。

寻找着车辙印迹，我们把空车向上推去，上山就要转弯，我们转